

哲学视域下的转喻研究

李克, 李淑康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

摘要: 转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格,更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模式。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转喻引起了语言学界以及哲学等学科的关注。通过分析转喻的认知性、逻辑特征,进一步揭示转喻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AS 认知方式以及转喻映现的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转喻; 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 AS 认知方式

中图分类号: B089;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1)02-0135-05

转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它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同一类领域内其他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存在于社会、语言、文化、体育、经济等各个领域。经验是转喻产生的根源。经验会成为人们的潜意识,不断地在大脑囤积,逐步建构人们语言的的心理词库。一般来讲,转喻不仅仅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更是一种人类的认知方式。它所承载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概念与概念之间形成互动的的基本理据。它通过对认知对象概念域的调整、突显其某一侧面并转换认知视角,从而为认知主体提供新的认知和体验。由此可见,转喻体现着人们的一种体验。即我们的概念、推理和心智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如,在英语中的谚语“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中,“hands”的转喻运作机制便体现了人们的一种源于自身的体验;只有有这种劳动体验的人才能透彻地解读这个转喻过程。用已有知识或经验来处理当前知识或经验,这是人们从小就有的、习以为常的最基本的认知能力,它来自于人们的生活体验。正是人们亲身体会而形成共识塑造了认识世界的认知概念系统^{[1]36}。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也体现了语言与现实之间的映射关系。语言来自于人们所感知的现实世界,现实也会影响语言的建构。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感觉器官在与现实世界互动体验之上通过认知加工逐步形成的,是主客观多重互动的结果,这就必然要得出语言具有体验性这一结论^{[2]8}。转喻便具备这种体验性特征。

一、转喻的界定

在英语中,转喻(metonymy)一词源于希腊文

中“metonymia”一词,后者又由“meta”(转变)的“onoma”(名称)合成。

实际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转喻便被认为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修辞手段。亚氏认为使用诸如转喻等修辞手段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联想,增强语言的魅力以获得理想的修辞效果。传统修辞学把转喻看成是一种用某事物的名称代替邻近事物名称的修辞手段。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从全新的角度考察了转喻,认为它不仅仅是修辞手段,更是有力的认知机制和思维方式。Lakoff^[3]将转喻看作是发生在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式(ICM)中的替代关系。Langacker^[4]把转喻定义为“一种参照点现象,是一个实体通过转喻表达以参照点的方式为目标域提供心理通道的过程”。Radden & Kövecses^{[5]21}则指出,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即喻体)在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内向另一概念实体(即喻标)提供心理可及。这个定义实际上涉及三个问题:一是转喻会出现在有ICM的地方;二是这一心理桥梁使形成概念的人可及想要描写的目标,这涉及到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关系;三是有一些概念实体可以更好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目标上去^{[6]4}。如:

(1) And as a Warsaw Pact leader they know him more intimately in the Kremlin than in the West.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AAP 287)

要解读上句,读者需构建一个关于“the Kremlin”的理想化认知模型,我们可以把上句中的“the Kremlin”理解为“the Russian government”,因为来源域“the Kremlin”与目标域“the Russian government”之间发生转喻运作。Mendoza^[7]认为,这

收稿日期: 2010-04-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词汇语义的认知语言学研究”(09YJA740070)

作者简介: 李克(1981—), 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E-mail: keylee_0925@163.com

是一个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

虽然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于转喻,某些学者给出了较为系统与科学的界定。卢卫中、刘玉华^[8]认为,有关转喻运作机制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映射理论;二是凸显/激活说;三是心理通道说。基于以上三种思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统一模式。在这个统一模式里,选择参照点是转喻的起始阶段,而映射、凸显/激活和提供心理通道则是转喻的实现阶段。这与 Radden & Kövecses^[5]揭示的两个重要方面(喻体的功能、喻体与喻标之间的关系)基本一致。

关于转喻的分类,学者们也做了一定的研究。Panther & Radden^[9]做了较为系统的分类,他们把转喻放到理想认知模式中考察,将转喻高度概括为两大类:整个 ICM 和其各部分之间的转喻;ICM 各部分之间的转喻。整个 ICM 和其各部分之间的转喻又分为不同的 ICM 如整体和部分 ICM、量度 ICM、构成 ICM、事件 ICM。ICM 各部分之间的转喻又具体分为行为 ICM、感知 ICM、生产 ICM、控制 ICM 等。Yves Peirsman and Dirk Geeraerts^[10]以邻近性为出发点结合原型理论对转喻进行分类。国内学者中,张辉、孙明智^[6]提出了四类转喻:低层次命题转喻(即指称转喻)、低层次情景转喻、高层次命题转喻(即语法转喻)、高层次情景转喻。文旭、叶狂^[11]提出了两大类转喻:理想化认知模式(ICM)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和同一个 ICM 中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转喻,与 Panther & Radden^[9]的分类相近。

二、转喻的认知性

与隐喻相同,转喻也是基于人们的基本经验,其实质是概念性的,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认知过程,是丰富语言的重要手段^[12]。正如 Gibbs^[13]所说,用转喻思维与谈话是我们日常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喻基于邻近联想,是人类感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指称、描述事物的重要手段。转喻与隐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人类感知社会、建构经验的强有力的认知思维工具。转喻已被广泛地看作是一种心理映现的方式。通过转喻,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一个人、事物或者事件的突出特征来识别这个人、事物或者事件。因此,转喻是一种人类认知思维方式。它通过抽象或具象两种逆向的思维活动扩大或缩小人类的某一认知域,并借助整体-部分之间的心理可及而喻指对象。换言之,转喻是基本的思维方式,即用突显、易感知、易记忆、易辨认的部分代替整体或其他部分,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代替部

分的认知过程^[14]。

语言中大量的转喻反映了人们普遍的思维模式。如,

(2)While the kettle is boiling he scans the front page.(British National Corpus, ANY 122)

在我们的认知模式里,“the kettle”是最突显的、最容易感知和识别的。而实际上,“the water in the kettle”这个不突显的事物才是“boiling”的“主语”。在此认知过程中,转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自身的经验也潜在地影响着对事物的感知。转喻基于人们的身体体验,触发人们的联想认知。甚至比隐喻更加重要^[15]。

转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转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转喻不是伟大诗人的创新,而是人类正常认知客观世界的方式,是人类所有思维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正是转喻,把哲学中的理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赋予其巨大的解释力,使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

三、转喻的逻辑特征

自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充分论证了转喻是一种思维现象。这就表明,转喻不可能是脱离了人们的思维特征、思维规律的。那转喻就更不可能是“非逻辑或反逻辑”的,它也应有其自身的逻辑属性和逻辑特征^[16]。徐盛桓^[6]比较详尽的论述了转喻的逻辑特征,他在研究中指出,转喻的逻辑特征可表述如下:分类逻辑的意识是转喻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转喻总是在分类逻辑的总体框架里运行,转喻的实质是利用不同层级的类的内涵外延的逻辑传承关系,从而体现了其自身特点的分类的配置与排列。这表明转喻是有逻辑理据的。

一般来讲,转喻的运用涉及了类的转换。例如,

(3)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后宫词》)

(4)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去……(《故乡》)

(5)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有的人》)

例(3)中的“红颜”是女性最光彩照人的部分,而此处指女人。(4)中的“圆规”更是指代故事中的一个人。(5)中的“石头”是通常用来作纪念碑的材料,这里借“石头”指称纪念碑。总之,以上的转喻操作都涉及两类事物的转换。

其实,转喻就是“类”与“类”之间的转换,转喻

操作必须基于人们对事物的分类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这种分类共识的达成依赖于人们的感知与体验。否则,转喻所指涉的人、物以及事件就无法在说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取得一致。由此可见,分类逻辑可以看做是转喻操作的理论框架,同时,分类逻辑的建立也基于人们的感知与经验,因此与人们的体验也有一定关联。在传统上,逻辑是作为哲学的分支来研究,因此,转喻与分类逻辑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对转喻的一种哲学探讨。

四、转喻的哲学基础

(一) 体验哲学

当代哲学三大派系——唯理论、建构论和经验论对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意见各不相同。Lakoff & Johnson^[1]提出“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构成当代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Lakoff认为,人类语言离不开体验感知,其对于世界的经验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结构和意义。Lakoff & Johnson^[1497]指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这与我国古代所宣称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有异曲同工之处。所谓“近取诸身”应该始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取”和“代”,尤其是始于人体整体与人体部位之间的“取”和“代”。我们认为,这也许正是与“人”相关的转喻相当丰富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同时也体现了语言和思维的“体验性”特征。Marina Rakova^[17218]指出,人类的思维是基于我们自身的身体,以一种与身体相关的方式构建的。王寅^[1887]再次重申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转喻的哲学基础也可以看作是体验哲学。这一点从转喻的认知性可见一斑。结合体验哲学,转喻具有一个人体转喻化的特征。人体转喻化是指利用人的功能特征对其他事物进行概念化,其特点为凸显人体的某种功能特征。人体转喻化过程中凸显的功能特征包括:人体部位的抽象智力能力、抽象情绪功能和人体部位的重要性等。如,

(6) Emperors have long hands.

(7) “伤心”

(8) The move was part of a radical ministerial reshuffle by John Major designed to bring new blood to the Government after the Conservative election victory. (BNC: AK9 4)

以上三个身体部位“hand”、“心”和“blood”分别转喻地指代“权力”、“心情”以及“成员”。所有这些

转喻操作都是基于人的身体体验的。这样的转喻表达更清晰。人们用转喻是为了方便认知、表达和理解^{[19]42}。

(二) AS 认知方式

体验哲学的主要思想有三条: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其中尤其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这对于语言的成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17]83}。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王寅^{[20]2}将概念明喻称为“AS 认知方式”,并认为该认知方式可用来统一解释认知语言学中述及的转喻。“AS 认知方式”比其他认知方式更为基本、更为简便、也更为普遍。他认为,该认知方式是在人类生活体验中逐步形成的,它既来自生活,又应用于生活,具有鲜明的体验性。“AS 认知方式”是在概念双向融合中不断形成“新创结构”的基础。它还直接影响着其他认知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是转喻等形成的基础。

转喻常被描写为同一概念域或理想化认知模型中整体替代部分,或部分替代整体,或一个部分替代另一个部分。之所以在转喻中发生双向映射,是因为“AS”关系中的双方本来就是互为前提的^{[20]3}。

“AS 认知方式”符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突显了语言研究中的人本精神。语言是人们在与现实世界互动中,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表达方式必然体现人的认知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AS 认知方式与体验哲学是不冲突的,两者均可以看作是转喻构建的哲学基础。

五、语言与现实的关系

Koch Peter^{[21]139}认为转喻不是一个语言结构的问题而是语言与外部世界之间联系的问题。谈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语言反映现实^{[22]356}。转喻是不是也会反映现实呢?从前面的讨论中可见一斑。

当然,实证哲学家们认为,任何辞格跟“事实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当然,转喻也不例外。实证哲学家孔德认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唯一来源和基础是来自观察实验的经验事实。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之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转喻本身是发生在同一个认知域内的认知操作。其表面映现出的“知识”并不是“观察实验的经验事实”,因此,在实证哲学家的眼中,转喻与现实无关。然而可能世界语义学却持不同意见。

可能世界语义学认为,现实世界只是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23]85},其他可能世界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的。现实世界只有作为诸种可能世界之一才能

得到理解^{[21]358}。“一个可能的世界是由我们赋予它的描述条件给出的”^{[24]183-184},因此,我们通常可以根据常识判断某语句命题在某可能世界的真假,所以语句命题是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映射。这一点完全适合转喻语句的真值条件^[69]。徐进一步按不同的“可能”区分为三个世界:语境里所体现的事物是现实世界里的事物(可能世界1);语境里所体现的事物是想象世界里的事物(可能世界2);语境里所体现的事物是特设世界里的事物(可能世界3)。一般来讲,以上三种可能世界都可能是与转喻语句有关的语境。

转喻这种语言现象与现实之间的任何可能关系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研究者的出发角度不一。有学者指出,语言映射现实世界,投射想象世界,折射可能世界。我们认为,基于体验哲学与AS认知方式,转喻的产生源自人们的生活体验,也源自我们的现实世界。没有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深切体验,是很难产生转喻思维的。人们凭空不会想象并创造出合乎常理的转喻,否则就是一些“空想”、“幻想”。因此,转喻反映着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与现实是分不开的。

谈到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必然会涉及到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有些学者对此作了一定具有深刻意义的研究。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把精神分析学向语言学敞开大门,他指出,能指的结构是互涉的链环,它作为“链上的一环,而这链又是合拢在由环组成的另一个环上”。对此他将其命名为能指链。能指链的这个结构所揭示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我与其他主体共有这个语言,也就是说,因为这个语言存在着,我就能利用这个语言来指称与它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事。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2] 王寅. 语言研究新增长点思考之四:后语言哲学探索——语言哲学、后语言哲学与体验哲学 [J]. 外语学刊, 2008(4): 2-10.
- [3]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4] Langacker R W.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 4(1): 1-38.
- [5] Radden & Kövecses.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C]/In panther and radden.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7-59.
- [6] 张辉, 孙明智. 概念转喻的本质、分类和认知运作机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3): 1-6.
- [7] Ruiz de Mendoza F, Otal Campo J L. *Metonymy, 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 Granada[M]. Granada, Spain: Editorial Comares, 2002.
- [8] 卢卫中, 刘玉华. 小说叙事的转喻机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 41(1): 11-17.
- [9] Panther K U, Radden G.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R]. Amsterdam: Benjamins, 1999.
- [10] Yves Peirsman and Dirk Geeraerts.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6, 17(3): 269-316.
- [11] 文旭, 叶狂. 转喻的类型及其认知理据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29(6): 1-7.
- [12]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拉康夸张地说,“通过这两重性,语言即使不完成一切也是组织了人间关系的一切”。构成人间世界一切的能指结构就是能指间的转喻和隐喻关系。这算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逻辑交待^{[25]37}。拉康进一步指出,“一个与另一个词的组合,这产生了转喻的效果”^{[26]39}。所谓转喻,在拉康看来就是作为能指的“词与词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关系的本质是“局部代替整体”。这是拉康的能指链中一个能指与另一个能指之间的共时性关系。转喻是“指称能指为产生意义而构成的实效场地的一个侧面”。

实际上,他颠覆了索绪尔的符号结构,因为拉康的能指与所指结构并不是直接面对对象的,符号是一种象征性的替代。因此,拉康的意思是更深一层的^{[25]58}。比如,我们在打牌时,如果缺少某一张牌,我们会用一张随便扑克牌大小的硬纸代替,或找另外一张牌标上所缺的牌码,这种象征性的替代体现了转喻所映现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六、结语

对转喻进行哲学思考,需要多视角的考察。本文中,笔者首先界定了转喻的两个侧面:认知性和逻辑特征;通过分析两种特征,进一步揭示出转喻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和AS认知方式;最后我们谈及了转喻所映现的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本文可以看做是对转喻的哲学思考的一个浅尝辄止的探讨,期待更为深刻的研究。本文中,笔者的思考也有些欠缺之处。对于转喻与可能世界的关系探讨不够。转喻是否可折射出“可能世界”的林林总总的事物,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 [13] Gibbs Jr R W.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4] 董成如. 转喻的认知解释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27(2): 6-9.
- [15] 蔡晖. 转喻思维产生动因的多元思考 [J]. 外语学刊, 2006(6): 41-45.
- [16] 徐盛桓. 转喻与分类逻辑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 40(2): 93-99.
- [17] Marina Rakova. The philosophy of embodied realism: a high price to pay?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2, 13(3): 215-244.
- [18]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34(2): 82-89.
- [19] 张建理. 汉语“心”的多义网络: 转喻与隐喻 [J]. 修辞学习, 2005(1): 40-43.
- [20] 王寅, 王天翼. “AS 认知方式”: 隐喻等机制的统一解释——十五论语言的体验性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 32(4): 1-6.
- [21] Koch, Peter. Frame and Cognity: On the Cognitive Bases of Metonymy and Certain Types of Word Formation [C]/In Panther, Klaus-Uwe and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1999: 139.
- [22] 陈嘉映. 语言哲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23] Lewis D. Counterfactuals [M]. Basil Blackwell, 1973.
- [24] Lewis D.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 [25] 褚孝泉. 拉康选集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26] 张一兵. 能指链: 我在我不思之处——拉康哲学映象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5(1): 55-61.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Metonymy

LI Ke, LI Shukang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Shandong Yantai 264005)

Abstract: Metonymy is more a cognitive mode of human beings than a rhetoric device. As an important linguistic phenomenon, metonymy draws the attention of both linguists and philosophers. The paper intends to discover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metonymy-embodied philosophy and AS mode of cogni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and logical features of metonymy. What's more, i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which metonymy reveals.

Key words: metonymy; philosophical basis; embodied philosophy; AS mode of cognition

[责任编辑: 箫姚]

(上接第 134 页)

- [5] E A 罗斯. 变化中的中国人[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5.
- [6]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7]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8]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9] 理查德·尼斯贝特. 思维的版图[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
- [10] 黑格尔. 哲学精神讲演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12] 佩雷菲特. 停滞的帝国[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2007.
- [13]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 [14] 罗素. 中国问题[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6.

Analysis of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Mode

CHU Yu

(Beij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97)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is built on images, lacking analytical, synthetic and abstract elements that are characterized by logical thinking process. It is stymied in senses. Confusion in thinking is prone to be stuck in vicious circles, leading to petrification of thoughts and constitut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pattern. This kind of confusion and rigidity has obstructe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confusion and petrification; obstructing China's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孟青]